

藏传佛教寺院经济学术综述

李江楠

青海师范大学, 青海西宁, 810000;

摘要: 寺院经济研究是宗教学领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分支。宗教与经济之间历来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紧密联系,尤其在藏传佛教文化圈内,宗教、政治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催生出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寺院经济形态。以寺院为中心,对物质财富的获得与消费,就构成了寺院经济的核心内容。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众多国内学者积极投身于该领域的研究,他们采用了文献考释、实地调研等多种方法进行相应的探讨。现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系统回顾与总结,旨在探索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研究的新动向。

关键词: 藏传佛教; 寺院经济; 述评

DOI: 10. 64216/3104-9672. 25. 01. 035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随着各学科领域的蓬勃发展,有关寺院经济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应的进展。在此期间,有关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论文不断发表,极大地促进了该领域研究的繁荣。这些研究成果丰硕,现将其分类概述如下:

1 寺院经济演变的研究

张敏、康建国以雍正二年(1724),清廷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为切入点,对清朝对青海藏传佛教寺院喇嘛的衣单口粮的限制进行分析。作者指出,衣单口粮等制度的实施并不能从根本上限制喇嘛寺院,但是这一羁縻政策使藏传佛教寺院的封建剥削制度和封建特权受到打击,客观上加强了民族团结。^[1]乌云以 20 世纪中叶,蒙古土默特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经济普遍陷入困境这一历史现象为切入点,对寺院经济面临的困境作探讨。作者指出乾隆以后寺院耕地渐趋衰败,民国年间寺院面临外部势力的侵占、内部僧侣和黑徒的盗卖、寺院佛殿僧舍的坍塌及被占,以上种种因素将寺院经济推入更深的危机之中,加快了土默特地区藏传佛教的衰落步伐。^[2]鲁顺元将地处青藏高原藏文化圈边缘文化带的塔尔寺和广惠寺进行对比分析,考察两寺不同的发展轨迹,并揭示寺院经济兴衰背后的历史和现实因素。作者强调,塔尔寺寺院经济的形式、规模和社会影响比广惠寺更丰富且广泛,且受宗教地位、主属关系等的影响,新时期广惠寺寺院经济,越来越缺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逐步走向衰落。^[3]朱文惠从历史人类学角度探讨藏传佛教,通过解读民族志和高僧传记等史料,对近现代藏传佛教寺院的贵金属、土地与劳动力的运用进行分析。作者阐述了以下几点:其一,交换使土地商品化,寺院

进而聚敛土地致富;其二,西藏社会中的凡人阶级过普通家庭生活,神圣阶级终身献给宗教;其三,黄金生产者将多余的黄金出售,商人负责将这些贵金属纳入商业流通体系,进而推动其在区域间的贸易流通。^[4]此里品初以噶丹·羊八景林寺为个案进行分析,围绕寺院的组织结构、供养结构、寺院僧侣的生计与消费展开系统阐述。作者指出,20 世纪 80 年代后的噶丹·羊八景林寺,完全转向依赖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作为其供养来源,这一转变凸显了寺院更为强烈且深厚的宗教情感与信仰根基。^[5]松丽芬以噶丹·松赞林寺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其在民主改革后寺院经济的发展情况。她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寺院经济适应市场经济环境和全民信教的基础是噶丹·松赞林寺新型寺院经济产生的根源,而新型经济又促使寺院经济管理模式的改变、自给自养的自主发展模式的形成及寺院旅游业的发展。^[6]

普华东智借助访谈资料,探讨供养与布施这一现象出现的成因、具体表现形式及带来的影响。作者认为“一切皆空”的物质观促使信徒捐赠大量财富,传佛教信徒对寺院作供养与布施不仅获得了“功德”,还获得了有形的经济利益和无形的文化资本,而这种文化资本能够间接地转化为物质财富,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循环体系,进而形成“愈圣神者愈福,愈福则愈圣神”的藏传佛教寺院景象。^[7]杨惠玲围绕宋元时期寺院势力与藏区封建势力的结合、中央政策对藏传佛教带来的影响等方面对宋元时期藏区寺院经济进行分析阐述。作者认为地方势力与寺院集团的结合、政教合一制度的形成及元朝政府实行的保护和优待寺院的政策都极大地促进了藏区寺院和上层僧侣经济力量的迅速增长。^[8]郎丰霞依托《清宫内务府奏销档》及相关档案史料,从微观和宏观两个

方面分析清廷藏传佛教寺庙与内务府财政之间的关系。她认为,在微观层面上,弘仁寺等三处寺庙在支用生息利银上经历了从专款专用到专款他用,并最终演变为摊派公用的过程。宏观层面,清廷藏传佛寺的发展高度依赖于内务府的财政支持,这一依赖性不仅推动藏传佛教走向全盛,也是清后期藏传佛教逐渐衰颓的关键因素之一。^[9]

2 寺院经济现状及对策的研究

开哇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就新时代藏区寺院如何“以劳养寺,以寺养寺”,兴办经济实体等问题展开探讨和论述。作者指出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背景下,藏族寺院应建立独特良性的市场经济模式、建立多元化的所有制,寺院收益分配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原则。^[10]周兴维对四川藏区民众的宗教生活、现代藏区中的寺院宗教经济等内容进行探讨,他强调,为了适时革新藏传佛教的传统教义,需要深入探索藏传佛教新教义的世俗经济基础,实现世俗经济与宗教经济的和谐共存,进而有效促进四川藏族地区在自然、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的和谐发展。^[11]丁莉霞通过实地调研,对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藏传佛教信仰和寺院经济的构成及现状进行分析考察。她指出基于藏区经济基础薄弱,藏传佛教寺院以及僧人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了一些“以寺养寺”的活动,但是建立在传统佛教功德观之上的部落及家庭供养仍是藏传佛教寺院得以正常运转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12]贾伟、李臣玲通过社会历史调查,结合安多农区寺院的文献资料,分析安多农区藏传佛教寺院的特点,探析寺院衰落的因素,并对其发展提出两点思考。关于寺院经济,作者认为宗教改革后,该地区传统寺院经济基本摧毁,新型寺院经济基础还未形成,应当重构寺院经济体系。^[13]郝旭东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开展为背景,对藏传佛教寺院给当地社会带来的影响进行阐述。作者强调,藏传佛教寺院经济在“自养”方针的指导下,拓宽了当地的就业途径,强化了当地的市场意识,同时针对当前寺院经济面临的问题,各相关部门应加强沟通、指导和协作,唯有如此,方能切实推动藏传佛教寺院经济实现持续且稳健的发展。^[14]徐双明以叶尔巴寺为研究对象,对其发展简史、“活佛转世”体系、僧人状况和宗教活动以及寺院发展困境进行分析研究。作者指出叶尔巴寺的经济分为两部分:其一是寺院内部综合收入,其二是僧人的私人经济。关于僧人经济来源,他认为主要是家人供养为主,此外还有信众的布施、低保、资助与自筹等途径。

^[15]姚学丽以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藏传佛教寺庙为对象,探究和静县寺庙的经济状况、人员情况及寺庙的作用。作者指出寺庙在经济上没有足够实力进行大规模维修和构建且收入来源僵化;寺庙僧源缺乏,学历较低,缺少师资,难以外出深造;寺庙的社会功能缺乏广度和深度等问题。^[16]高倩围绕拉卜楞寺的建立与发展、其建筑艺术、社会功能三方面对拉卜楞寺作系统研究。她认为位于甘青川康交界的拉卜楞寺是经济贸易中心,每年举办的法会和纪念会为各地区从事大规模经贸提供了机会,这一地理位置给当地带来商业繁荣,又极大地树立寺院宗教的威望。^[17]丁莉霞分析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现状,并总结其演变过程的特点。作者考察寺院经济的发展模式和收入来源情况后,认为寺院经济来源有三:社区输血供养、寺院造血自养、社会保障。最后作者指出,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西藏和四川省藏区藏传佛教寺院经济呈现出产业化进程缓慢、区域及城乡差异大、经营管理失之粗放等特点。^[18]

毛瑞对喀德喀寺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行深入研究,并对喀德喀寺的管理机制及其与其他寺院的关系进行探讨。他指出寺院的经济主要依靠信众的布施和微信红包,僧人的收入来源于念经所得布施及举行一些佛事活动。^[19]还有一些学者对寺院经济的现状进行考察,如羊真卓么《贵德县藏传佛教寺院尕旦寺的历史与现状考察》^[20]、卓尕措、仁青龙珠《支扎上寺寺院经济活动调查报告》^[21]等。

3 寺院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研究

杨晨围绕寺院财产、财产来源和消费群体三方面对藏传佛教寺院经济作简要分析,对寺院的高利贷、地租、牧租、商业贸易等经济活动进行阐述。最后作者指出,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赋役制度的改革,清代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1840 年以后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藏区寺院经济也随之没落。^[22]张振伟以南传佛教寺院一景真总佛寺为个案进行分析,考察寺院经济给傣族社会带来的影响。作者指出,南传佛教地区的寺院经济在多数历史时期是以村民的就近供养为主,僧侣的自养只在部分佛寺存在,规模也较小,没有对整个南传佛教寺院经济的运行产生结构性的影响,但是寺院经济起到增强傣族民众的身份认同,平衡地区经济结构和抚慰民众心理的作用。^[23]覃江用宗教的神圣-世俗二元分类模式来分析藏传佛教中僧侣与寺院经济的二元性。作者指出,寺院的神圣性与世俗性程度与经济的富裕与贫困程度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即

寺院和僧人的宗教“神圣性”越高,其经济实力往往也越强。^[24]格藏才让以藏传佛教的格绒供奉为切入点,讨论中心寺院与边缘社会间的关系。作者指出,在藏区推行格鲁派化强权运动的背景下,被边缘化的小教派并没有停止对处在中心的格鲁派制度和文化的借用行为,如边缘寺院对“供奉表”的采用及对中心寺院结构的模仿。同时作者认为,整个寺院经济结构还是维持了群众—寺院—活佛三者之间的社会结构。^[25]刘江荣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调研所得有关青海省扎毛村的藏传佛教寺院经济辩证批判,并对其现代化特征进行探究。作者指出,寺院经济与世俗经济的相通性表现在世俗家庭供养寺院阿卡的经济联系中、寺院经济实体与世俗经济实体存续发展的一致性、寺院宗教法会与世俗社会生产收获时节的高度重合三方面。^[26]杨红伟围绕藏传佛教的经济伦理、甘青藏区的寺院市场和农牧业生产等内容,对藏传佛教与近代甘青藏区发展的关系进行探讨。他指出,藏传佛教在财施、法施与无畏施的基础上,吸纳社会财富,逐渐成为区域社会的财富中心。寺院以其消费能力与剩余资本存量影响着区域社会市场分布。此外,寺院生产资料的集中造成宗教经济剥削,但同时藏传佛教起指导农牧业发展的作用。^[27]许斌与周智生选取滇西北高原山地中的东竹林寺作为研究案例,通过质性研究法、实施问卷调查,并结合GIS技术工具,借助共生理论框架,对东竹林寺及其毗邻村落之间存在的共生关系展开了全面的分析与探讨。研究结果表明:以宗教信仰为纽带的寺院与村落的共生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并长期以来形成了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的互动关系。^[28]张甜对近代康区境内的藏传佛教寺院的各项经济活动进行分析论述,探讨寺院经济给近代康区社会的发展与转型带来的影响。作者强调,康区各方的支持使寺院积累大量财产,并依靠这些经济资本从事商业活动,加之宗教功能的加持,寺院经济成为整个近代康区社会的经济中心。寺院经济带来的影响,一方面维护康区的经济运行制度,另一方面挤压康区新型经济的生存空间,给社会转型带来压力。^[29]

4 对寺院经济的系统研究

杜常顺以明朝在河湟洮岷地区推行“众建多封”的政策为切入点,对家族性寺院在地方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影响及其兴衰沉浮做了探讨。他指出,家族性寺院在经济上具有雄厚的实力,以僧团名义聚集财富,他们广占土地、牧场、山林及孳畜,富甲一方。由于其政治权益的扩张损害了封建国家的利益,至雍正初年,

清朝平定青海蒙古贵族罗卜藏丹津叛乱后,对河湟洮岷地区家族性藏传佛教寺院进行的全面的清理和整顿,使寺院势力走向全面衰落。^[30]《藏族宗教与文化》围绕本教与藏族早期社会、佛教的传入、藏传佛教各宗派、寺院教育和法会、宗教与经济、宗教乐舞等内容对藏族社会生活展开论述。其中宗教与经济的内容,作者以西藏社会中的三大领主为切入点,阐述三大领主对生产资料(西藏土地)的占有情况。^[31]才让加针对学界对藏传佛教寺院从事经济活动的不同的学术用语现状,从藏族寺院经济、藏区寺院经济、喇嘛教寺院经济、藏传佛教寺院经济四个角度进行分析阐述。作者推敲后认定“藏传佛教寺院经济”最为贴切,他指出此概念是以藏传佛教集团为中心而发生的经济关系和所进行的活动,是反映寺院经济特有属性的思维形态。^[32]彭晓静对大崇教寺新发现契约文书按照时间顺序进行解读,考察岷县地区寺院经济所有权的演变和寺产转移情况等内容。作者强调,大崇教寺的土地获取途径与中国古代寺庙土地来源渠道基本一致,契约文书的内容反映出大崇教寺在经济上与世俗社会存在诸多交往,对其解读则使读者对大崇教寺的历史有进一步了解。^[33]还有一大批学者从宏观角度对寺院经济进行分析论述,如高云松《藏传佛教视域下的活佛研究——以F县R寺为例》^[34]、杨明洪、涂开均《精神资本视阈下的藏传佛教寺院经济》^[35]、乔桂红《清代藏传佛教政策与格鲁派寺院集团形成研究——以藏彝走廊北部地区为中心》^[36]、李雯婷《甘青川毗邻地域藏传佛教研究》^[37]等。

5 结论

寺院经济研究一贯被视为藏区社会文化研究的关键领域之一,国内学者在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是可喜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这些研究大多是一种形式论的探讨,如围绕寺院经济的演变、寺院经济的含义、寺院僧侣的经济活动等内容,对寺院经济进行宏观研究,忽略了深入探究寺院经济行为背后所蕴含的文化逻辑。其二,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大多以论文形式呈现,尚缺乏一些全面且系统性的专著进行深入探讨。

但也应看到,越来越多的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视角审视寺院经济,这类跨学科的研究揭示了许多以往研究范式下未被充分重视或理解的内容。综上所述,通过对学术领域内研究成果的综合分析,当前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研究仍留有诸多待探索的领域,预示着广阔的研究空间与显著的学术发展潜力。

参考文献

- [1] 张敏,康建国.从衣单口粮制度看清代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的兴衰[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6(01):27-29.
- [2] 乌云.20世纪中叶土默特地区寺院经济初探[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2(03):41-45.
- [3] 鲁顺元.文化圈边缘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兴与衰[J].青海社会科学,2012,(06):163-168.
- [4] 朱文惠.近现代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研究:贵金属、劳动力与土地[J].中国藏学,2013,(01):112-119.
- [5] 此里品初.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个案分析[D].云南大学,2014.
- [6] 松丽芬.论噶丹·松赞林寺寺院经济的历史演变[D].云南大学,2014.
- [7] 普华东智.浅析藏传佛教寺院的“供养与布施”[J].西藏发展论坛,2015,(04):78-81.
- [8] 杨惠玲.宋元时期藏区寺院经济发展的原因[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4(01):85-89. DOI:10.16783/j.cnki.nwnus.2017.01.011.
- [9] 郎丰霞.内务府财政与清廷藏传佛教寺庙发展关系探析[J].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04):112-123.
- [10] 开哇.关于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现状的调查与思考[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0,(04):44-48.
- [11] 周兴维.四川藏区藏传佛教寺院宗教经济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08):20-24.
- [12] 丁莉霞.甘南藏传佛教信仰以及寺院经济的现状考察[J].世界宗教文化,2010,(03):67-73.
- [13] 贾伟,李臣玲.当代安多农业区藏传佛教寺院的现状与思考[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3(05):70-74.
- [14] 郝旭东.引导藏传佛教寺院经济健康发展[J].中国宗教,2011,(10):60-61.
- [15] 徐双明.安多古刹一叶尔巴寺的历史与现状研究[D].兰州大学,2011.
- [16] 姚学丽,周普元.新疆和静县藏传佛教寺庙调查[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3(07):69-73.
- [17] 高倩.拉卜楞寺的调查与研究[D].兰州大学,2013.
- [18] 丁莉霞.当代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现状及其管理探析[J].世界宗教文化,2014,(01):72-77.
- [19] 毛瑞.喀德喀寺(?):一座汉藏边界藏传佛教寺院的历史与现状研究[D].兰州大学,2017.
- [20] 羊真卓么.贵德县藏传佛教寺院尕旦寺的历史与现状考察[J].青藏高原论坛,2018,6(02):90-94.
- [21] 卓尔措,仁青龙珠.支扎上寺寺院经济活动调查报告[J].青藏高原论坛,2019,7(02):36-41.
- [22] 杨晨.藏传佛教寺院经济及其社会影响[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2):115-117.
- [23] 张振伟.南传佛教寺院经济运行及其对傣族社会的影响——以景真总佛寺为例[J].文化遗产,2011,(04):137-142.
- [24] 覃江.从神圣与世俗的二元性看藏传佛教寺院经济与藏区社会发展[J].社会科学研究,2011,(05):142-147.
- [25] 格藏才让.从寺院经济活动看中心寺院体制与边缘社会间的关系——以青海东那寺和四川鱼托寺为例[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3(06):63-66+70+140.
- [26] 刘江荣.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现代特征——基于青海省扎毛村的调查[J].社会科学论坛,2012,(10):209-215.
- [27] 杨红伟.藏传佛教与近代甘青藏区的社会经济[J].青海民族研究,2016,27(01):1-9.
- [28] 许斌,周智生.滇西北高原山地型藏传佛教寺院与村落共生关系研究——以德钦县东竹林寺为例[J].世界地理研究,2018,27(01):104-120.
- [29] 张甜.近代藏传佛教寺院经济与康区社会(1905-1949)[D].西南民族大学,2022.
- [30] 杜常顺.明清时期河湟洮岷地区家族性藏传佛教寺院[J].青海社会科学,2001,(01):98-101+97. DOI:10.14154/j.cnki.qss.2001.01.023.
- [31] 魏强、周润年等著:《藏族宗教与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
- [32] 才让加.“藏传佛教寺院经济”正义[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03):64-66.
- [33] 彭晓静.甘肃岷县大崇教寺新发现契约文书研究[D].西北民族大学,2011.
- [34] 高云松.藏传佛教视域下的活佛研究[D].吉林大学,2018.
- [35] 杨明洪,涂开均.精神资本视阈下的藏传佛教寺院经济[J].世界宗教文化,2019,(03):94-102.
- [36] 乔桂红.清代藏传佛教政策与格鲁派寺院集团形成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21.
- [37] 李雯婷.甘青川毗邻地域藏传佛教研究[D].四川大学,2021.

作者简介:李江楠,女(2000-05),汉族,河南开封,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西北史